

“十二五” 規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長期繁榮穩定 (人物專訪)

《“一國兩制” 研究》編輯部

被訪嘉賓：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賀一誠**先生
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先生
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李向玉**先生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唐曉晴**議員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麥瑞權**議員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郝雨凡**院長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懷效鋒**院長

採訪日期：2011年3月17-23日

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及十一屆全國政協四次會議在2011年3月於北京順利召開，主要焦點是討論並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十二五” 規劃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民生改善，進一步體現以人為本施政理念，同時對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也提出了全新的安排，包括支持澳門建設成爲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這對澳門特區新一輪發展有着重大意義。爲及時作出回應，《“一國兩制” 研究》編輯部於2011年3月17-23日就澳門特區該如何實落“十二五” 規劃中所提及的區域協調發展、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營造“文化軟實力”、“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推動國家和平統一等相關主題，進行了系列人物專訪，當中包括親身參加上述會議的澳門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以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七位。七位受訪嘉賓的訪談深入淺出，言簡意賅，頗富啓迪。現將訪問內容摘要刊登與廣大讀者分享(本訪問稿根據現場錄音整理而成，相關觀點不表本刊立場)。

加強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粵港澳合作

區域協調發展是“十二五” 規劃中提出的一個重要目標，而適值兩會期間，廣東省和澳門正式簽署了《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受訪嘉賓各自表達了對於澳門應當如何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區域合作機制的看法，以及對《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期待。

賀一誠：“十二五” 規劃中提出區域協調發展這個重要目標，對於澳門來說，就是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問題。在此，首先要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國家的整體發展不能缺少香港和澳門，“兩制” 只是制度不同而已，“一國” 才是大前提。“十二五” 規劃必須體現“一國” 的重要性，港澳已經回歸，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在“一國” 的前提下應該把港、澳作爲一個專篇，不要作爲結尾詞。所以，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座談的時候，我曾經建議“十二五” 規劃宜將在五年內能做到的事情集中在一個專欄裏，並爲港澳另闢專欄。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也好，香港商界也好，都多次要求發改委把香港寫進“十二五規劃”，這彰顯了其認同感；澳門的情況也一樣，大部分澳門同胞也希望國家在“一國” 的前提下支持澳門長期發展，這是主流意見。

2011年1月，兩會舉行之前，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曾在深圳開會就“十二五” 規劃及粵港澳合作發展發表意見，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港澳規劃的專欄包括了七個重大項目：廣深港客運專線、港深西部快速軌道線、蓮塘/香園圍口岸和深圳前海開發、廣州南沙開發區、橫琴開發以及港珠澳大橋的興建等。當中，後三項均與澳門的未來發展直接相關。

珠海橫琴開發區作爲粵澳合作其中一大重點，寫

進了“十二五”規劃的第十四篇，更通過《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得以具體化。這是與澳門有密切關聯的重要課題，是澳門融入粵港澳區域合作機制的關鍵環節。橫琴現有 106.46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如何妥善開發是一道大的思考題。我一直強調，發展橫琴的重點是人氣，我曾向多位到橫琴進行考察的中央領導人反映這個問題。澳門人口非常密集，橫琴則很稀疏，澳門與橫琴在這個方面應該互補，利用澳門帶動橫琴的人氣。我認爲要提高橫琴人氣的一個有效方法是吸引一部分澳門人到橫琴居住，讓橫琴作爲一個緩衝。但是，我不認爲把老人院和貧困人士轉移到橫琴是一個好方向。橫琴的發展需要一個高的起點，應該吸引澳門的中產階級以及年輕一族。倘若進出方面，房價比澳門便宜，澳門人會樂意移居橫琴的。當然，這需要澳門政府制定方便市民的政策配套，比如在橫琴應設有沿用澳門師資和教材的幼兒園和小學，解決在當地居住的澳門人的需要，這樣便可以有效地提高橫琴的人氣。

劉藝良：在兩會期間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二五”規劃。港澳首次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規劃之中，體現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關心、支持港澳的發展，港澳特區政府和市民也感到十分欣慰。爲了制定“十二五”規劃，國家作了全方位的諮詢，並到港澳聽取社會各界的聲音，包括市民和人大政協的意見。“十二五”規劃的建議草案稿是通過廣泛諮詢眾多專家學者、權威人士、各民主黨派、人民群眾而形成的，草案是規範的、科學的。在兩會期間，港澳地區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認真地對草稿進行討論，發表相關的意見，整個會議氛圍民主科學，各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認真履行責任，並不是外界認爲只是橡皮圖章。舉一個例子，“十二五”規劃中有一個粵港澳合作重大項目一覽表，其中廣州南沙新區開發是“打造服務內地，連接香港的商業服務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教育培訓基地”，當中沒有提及澳門。如果廣州南沙新區是只面向香港，不面向澳門，這個寫法完全合理，但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就有廣州南沙新區的項目，於是澳門區代表在審議時便提出，如果國家“十二五”規劃不把廣州南沙新區合作跟澳門相連接，《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就是違背了“十二五”規劃的精神。結果在定稿時，廣州南沙新區開發中的“香港”就變成了“港澳”，把澳門納入規劃之中。我很高興國家採納了我們的意見。另一個例子是關於澳門教育服務一項。在支持港澳培育新興產業這一節，說到“支持香港醫

療、教育服務”，沒有提及澳門在環保、教育服務這方面的工作。我認爲澳門教育服務也很重要，澳門有超過十所大專院校，培育了很多內地學生，特別是澳門大學，國家主席親自主持橫琴新校區動土儀式，這是國家主席首次親自主禮一座大學校址的動土儀式，強調要把澳門大學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也提到以後要加強教育方面的合作，包括培育內地的學生，爲珠海學生的錄取分數提供優惠，最後在定稿中，就增加了“教育服務”一項。在整個文本的修訂中，我親身體會到民主精神的充分發揮。

雖然澳門經濟規模比較小，但我們一直希望在粵港澳合作中也能夠同等地參與其中，優勢互補，互惠互利，達致三贏。“十二五”規劃的內容讓特區政府和港澳市民都感到很欣慰，也感到必須要抓住這個機遇，融入區域合作的大潮。務必去掉各自爲政的理念，實現資源共享，避免重複建設、浪費資源。澳珠發展難免會有競爭，但是要考慮到作爲一個區域整體，就需要協調發展。因爲當中牽涉到利益分配的問題，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要從思想上、理念上重視我們確實是一個整體。現在有珠江三角洲同城化、珠澳同城化、江中珠澳同城化等提法，但我認爲同城化的提法是不太科學的。內地珠三角九個城市是一個制度，政策可以共用，和澳門在“一國兩制”下的制度是不同的。我們實行自由港的政策，低稅率、沒有外匯管制、人員進出自由、沒有關稅，但內地不行，所以我建議使用“緊密的合作關係”的提法。更緊密也是一個整體，所以才有了《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例如，珠海機場和澳門機場有各自的定位，因此兩個機場應該盡快達成合作共識。澳門機場自從 1995 年啓用以後，就有一個很特殊的而爲珠海機場不可替代的功能——承辦澳台航線。台灣居民只需持護照，不用簽證就可以進出澳門，比進入香港和內地都要簡便。澳門可以很好地爲台商進入珠三角服務發揮平台角色，但是珠海多年來在這個方面利用得還不如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在中山的台商就比珠海多。澳門機場是國際機場，珠海機場是國內機場，大家可以協商，避免浪費資源，功能重疊。

粵澳合作其中最重要就是珠澳合作，珠澳唇齒相依。通關便利化就是兩地合作的關鍵一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裏就談到了口岸建設方面的措施。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兩地已經達成很多共識，包括硬環境、軟環境的建設，通關時間的安排等。現在珠海與澳門之間有四個口岸，拱北口岸、橫琴口岸、灣仔口岸跟

跨境工業區茂盛圍口岸，如何把這四個口岸資源合理科學地調配與共享是很重要的。珠海跟澳門這幾年的客流量增長得很快，1999年拱北口岸新聯檢大樓落成的第一年，出入境人次只是3,100多萬，到了去年已達8,400多萬，將近翻了三倍。但現有的聯檢大樓在1999年落成時，設計的客流量是每天15-20萬人次，現在每天平均23-24萬，今年春節期間最高峰達29.7萬人，3月其中一天更突破了30萬，給拱北口岸造成了很大的通關壓力。而於09年擴建後的澳門關閘口岸每天通關容量可以達到50萬人次，所以要按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精神加快拱北口岸聯檢樓的擴建，計劃中擴建後的拱北口岸也能容納50萬人次，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達到每天35萬人次，再預留15萬人次空間。擴建工作在前幾年已經獲得國家發改委、海關總署、廣東省政府的認可，原來計劃在2009年與澳門同步擴建完畢，結果因各種原因沒有完成，現在要抓緊。拖延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資金問題，按照政策，口岸建設權是在地方政府，使用權在聯檢單位，但我們認為作為國家一類口岸，不應所有的建設資金都由地方解決，這對地方的財政造成太大壓力，也不公平，所以我與其他幾位代表曾在兩會期間提出建議，希望在資金上加大大對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得到了國家發改委、廣東省政府及海關總署的認同，撥給了一部分資金，減輕了地方政府負擔，有望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完成擴建工程。科技通關也有助於兩地的通關便利化，現在邊檢部門已經採取了很多科技通關的手段，如自助通道，給予出入境的旅客很大便利。除了港澳居民，還擴展到多次往返的內地旅客，包括在澳門的外勞。接下來我們希望改造內地通行證的證件，現在是用本式，希望改成卡式，進一步推動電子化，提高通關速度和通關效率。另外，希望口岸擴建完成以後，按粵澳達成的共識把從出口到澳門的鮮活產品移師到跨境工業區口岸，以淨化拱北口岸的通關環境。改善了通關環境以後，隨車人員的出入境檢驗廳也可以啓用。接下來是推動延長通關時間，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舉措，延長了通關時間以後，再按實際環境研究實施24小時通關的可行性，分階段執行，避免浪費資源。

橫琴作為粵港澳合作先行先試的示範區，在“十二五”規劃及橫琴整體發展規劃的原則下，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簽署的基礎上，希望能盡快為橫琴制定特殊政策。我幾年前亦曾經提出希望把橫琴建設成一個特區中的特區的建議，就是有別於經濟特區，也有別於行政特區的特區。現在確實在朝這個方向推進，而且已經有一個框架方案了，包括分線管理、關

稅及稅率。澳門的車輛不用“兩地牌”可以進入，關鍵就是要探討特殊政策如何落實。比如分線管理，是否在現有的橫琴口岸作為一線口岸，在橫琴橋設二線口岸，政策如何推行、便利通關的方式如何？有人提出把澳門自由港的低稅率政策推行到橫琴，比如澳門的所得補充稅率最高12%，內地一般是25%，經濟特區可以低至15%，澳門的稅率是不是適合延伸到橫琴？掛着澳門車牌的車輛到了橫琴如果發生交通意外，澳門的保險公司認不認可？實行24小時通關，還是先跟拱北口岸同步通關時間？口岸配套設施如何建設等，這些問題都要進行探討，其牽涉面非常廣。此外，如何充分利用跨境工業區口岸作為目前珠澳之間惟一的24小時通關口岸？現在口岸的使用率很低，每天的下半夜基本沒有人出入境，浪費了資源。所以我與幾位代表也曾經提議，跨境工業區口岸可以跟拱北口岸協調發展，當拱北口岸閉關後，旅客可以通過跨境工業區口岸進出。但跨境工業區口岸現在是專用口岸，在跨境工業區裏面投資企業的人員、貨物才可以進出，所以有“專用”兩個字，我們建議將“專用”兩個字去掉，變成一個珠澳跨境合作區，增加口岸功能。這些工作都要按“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精神，進一步的推動。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簽署以後，確定了橫琴是先行先試的試驗區，協議內容本身就是支持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拓展澳門的發展空間，希望能補充澳門發展不了的產業，澳門宜認清橫琴的發展定位，好好利用。珠海規劃在十字門商業區或者橫琴發展會展產業，建造10萬平方米的會展產業區，澳門業界對此有所擔心，恐怕橫琴發展會展業會與澳門形成競爭關係。其實，面對橫琴發展會展業，澳門應看到其中相互協調帶來的好處，通過合作達到互利共贏。澳門適度多元化發展中，比較成熟項目的就是會展業，澳門這幾年舉行大型的國際性會議、展覽不少，硬件設置齊備，但澳門畢竟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內地的參展商來澳門面臨着出入境證件的問題，珠海就沒有這個問題，也沒有貨物出入境的管制問題，在這方面澳門的人流物流便利程度不如珠海，為了避免繁複手續，內地的大型會議就可以在珠海舉辦。但從另一方面看，澳門做專業會展、舉行國際性會議則更具優勢，國際上參展商和貿易商都希望通過澳門打入內地市場，因此國際性的會展更適合在澳門舉辦。澳門還要強調葡語系國家市場，內地很多參展商希望通過在澳門參展拓展國際市場，特別是葡語系國家的市場。澳門和珠海的會展業存在巨大合作空間，要加強合作，避免

重疊，錯位發展。絕對不能因為澳門要發展會展業，珠海就不能發展了，不能因為要支持澳門，讓珠海放棄自身利益，因為珠海本身的資源也不是很豐富。另外兩地的旅遊業也可以謀求共同發展、加強合作，發展一程多站，聯線旅遊。澳門每年接待 2,500 萬遊客，第一大客源是內地，第二是香港，第三是台灣，東南亞遊客也增長得很快。可以嘗試推廣聯線旅遊，比如台灣—香港—澳門—橫琴—內地，東南亞—香港—澳門—橫琴—內地，均是一程多站的聯線旅遊，還可以把整個消費市場帶動起來。文化產業也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澳門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幾乎是一個天然的影視城，人造的影視城則可以在珠海、在橫琴。珠海有良好的現代化城市環境，澳門則具有歷史意義的景觀。在橫琴可以建立國際性的文化產業合作區，作為澳門的產業的延伸。

另外，中醫藥產業在“十二五”規劃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都有談到，主要有關中醫藥的研究、研發。澳門和珠海均沒有天然的中醫藥的資源，但研發基地可以設於此，通過研發、開發，拓展市場，成爲一種產業。現在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廣東省和澳門已經在橫琴規劃了一個項目——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醫療改革是全國性最重要的難題，也是全世界的難題，內地老百姓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在一次列席人大常委會議時，參加了關於醫療體制改革報告的審議，會議中提出國內對中醫的發展重視不夠，在政策上支持力度也不夠，港、澳、海外反而更重視中醫的發展，比如澳門就很支持中醫的發展，中醫和西醫的分開監管，分別發給不同的營業執照。在上述醫療體制改革報告中，就提出要借鑒港澳的經驗跟政策發展中醫藥。這就是合作的契機。

粵港澳合作對於拓展澳門的發展空間很重要，加強跟內地合作，是澳門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舉措。澳門回歸以後，粵澳建立起了高層聯席會議機制，每年分別在廣東或澳門舉行會議，達成了不少的共識。“十二五”規劃與《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主旨均是爲了推動澳門把握機遇，把區域協調發展的共識加以落實。

李向玉：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展不平衡，百業待興，百物緊缺，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是戰略上的必須，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戰略是正確的。到了今天，“十二五”規劃更提倡科學發展觀，轉變增長模式，其內容非常豐富。

國家第一次在“十二五”規劃中，將港澳獨立成

章，以第十四篇第 57 章 3 節之篇幅予以闡述，這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突顯澳門的重要性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通過“十二五”規劃把澳門列爲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爲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向澳門特區政府以及澳門居民、社會菁英提出了今後將如何看待、應對和落實，才能與國家同步發展等問題。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已經在國家領導人批准簽署。其內容非常具體，例如，澳門將對廣東省的學生給予資助，這體現了粵澳兩地人民血濃於水的感情，也體現一種奉獻。把好鋼用在刀刃上，錢用以助人、助學、助教是最大的助人所樂。如果措施得到落實，可以使很多貧窮兒童有學習的機會，改變他們的一生。協議裏還有很多具體的措施，問題是如何落實？總的來說，要有清醒認識，要對事情的利弊，做出分析，訂出具體可行的措施，逐項加以實施。

就整體而言，澳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論法律制度，內地與澳門實行不同的法律制度，二者必然有碰撞，甚至有抵觸，尤其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定勢，內地有內地的清規戒律，澳門有澳門的成規熟習，所以，只要大家有了良好的合作願景，即便在落實時可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障礙和困難，但大家都需要本着一個莊嚴的承諾，主動去克服，而不是單方面的施捨和幫助，就能確保澳門的長遠繁榮穩定發展。

唐曉晴：區域合作對於澳門而言，是一個巨大機遇，澳門地方小，產業單一，但區域合作有望帶給澳門居民，特別是年輕人未來的發展機遇。“十二五”規劃下，國家給我們製造了一個很好的機遇，澳門不能坐等規劃自動完成，而應該在規劃內主動推進地區的整合。在基本法保障下，與鄰近地區一起推動資源及環境治理的整合。當然，現在很多工作還處在政府推動的層面，需要依靠政府多做工作以及各個相關部門積極配合展開，我相信通過我們政府首腦的全局把握和穩步積極的推進，澳門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都會圈的合作機制是指日可待的。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作爲國家級規劃，屬於框架性的協議，對雙方都有約束力，但在法律上不像具體的法條法規，能給予清晰的行爲指引。從行政角度看，地方需服從中央規劃，但正由於它只是一個框架，不是具體細緻的規範，是否與框架內容相抵觸，需要依靠相關澳門與內地地方政府自己去領會與把握，檢驗與評價只能留待 5 年或 10 年後。總體觀察，這是粵澳兩地居民的共同期盼，也是雙方真正互利共贏的有

效指引。

粵港澳三地的交流密切，在民事領域的法律交往一直以來都是比較通暢的。就公證業務而言，回歸以前就已經有內地的公證員在澳門承辦與內地有關的公證業務，而澳門的一些律師和公證員也得到國內的認可。可以說，公證業務已經有其展開途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加強。有了推動力後，展開會更快。而就未來橫琴會展業的行業規範和標準的制定，我認為，會展是國際性的，必須借鑒國外經驗，從行業規範的角度，學習具體操作方法，應以為與會者提供方便、快捷、高質服務為宗旨制定，不是單純立法就能解決的。

麥瑞權：針對這個問題，以下幾方面是澳門需要關注並認真對待的。第一，人力資源方面。人力資源是地區發展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澳門面積和人口總量過小，且是一個移民城市，人力資源的素質很參差，近年更由於社會的飛躍式發展與增長，故更顯得專業人才不夠，形成產業發展的瓶頸，在區域合作中易被邊緣化。澳門在“十二五”規劃中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當有客人來澳門休閒度假，目的是享受高服務質素，所以必須保證澳門的服務性產業從業人員擁有高素質。第二，環境保護方面。環保是地區發展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澳門定位為國際旅遊休閒中心，必須做好環保工作才能吸引國際遊客。澳洲政府曾經因為香港的空氣污染超標而向澳洲國民發出旅遊警告，如果澳門特區因環保問題而被一些國家地區發出旅遊警告，澳門如何打造成國際休閒中心？環境保護也是需要區域協調合作的重要一環，鴨涌河的污染是一個好例子，這個問題已經成為澳門與珠海之間共同合作治理的項目。環保是澳門的新問題，澳門經濟實力雄厚，環保可以設定更高標準，法規制定更應具前瞻性。第三，防止各自為政，“各家自掃門前雪”。老祖宗之言一直流傳至今，隨着時代變化，全球經濟一體化、區域合作的發展，“各家自掃門前雪”已經不適合時代需要。如何打破這種隔膜？實行起來並不容易。《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已出台好幾年，但至今卻未見有超越式的發展。眾所周知，難以推進實質發展的原因，在於未能協調利益的合理分配，這是由於各地均抱着“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另一方面，合作是相互的，要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區域合作機制，首先要革新思維。區域合作不該停留在講和寫等形式上，而應該着重如何去做及如何做得更好。《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是一個實質的協議，要大家用真心去做才有實效，社團要在區域合作中多發揮橋樑角色，尤其專業

社團，要發揮出謀獻策功能。“十二五”規劃不是一朝一夕，需要多方磨合才可以達致目標，特區政府要改變思維，適應新時期發展需要。

本人對澳門融入粵港澳合作機制有幾項建議。第一，如何提升人力資源。建議學習周邊地區如新加坡，留學生大學畢業後留澳工作滿七年，可成為澳門永久居民。澳門有吸引專才的優勢，澳門由小漁村發展至今的國際化城市，本土人才不多，故機會很多，回歸後的急促發展對內地專才來講，會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以環保為切入點。以鴨涌河污染治理為例，澳門特區政府應主動與廣東省、珠海合作，共同治理。在橫琴推動建設澳大環保校園，“無煙校園”、“垃圾不落地”運動。台灣用了八年，解決了垃圾不落地問題，其中成功的要訣是公民教育的成功，將垃圾分類及垃圾袋用者自付費用。至於鼓勵居民節約用水、用電等，亦需推行公民教育。澳門有條件帶頭做。第三，旅遊合作。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將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且橫琴開發區被明確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區域合作中，澳門應和鄰近的江門、中山、珠海一起，資源互補，打造“江、中、珠、澳聯線旅遊”。然後再擴展至整個廣東省。澳門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博彩旅遊業一直面向世界，國際化程度較高，但資源有限，比較適合短線旅遊，單單靠澳門自身的景點較難吸引長線客人。然而，在粵澳合作框架下，加上城際鐵路和澳門輕軌的修建，交通的便捷可以擴展澳門旅遊的腹地，通過相互合作，旅客在遊覽澳門後，還可以順道欣賞江門的僑鄉文化和中山的名人故居，享受珠海的海濱度假風光。

郝雨凡：一直以來，澳門產業結構單一，以博彩業為主要經濟支柱。這樣的經濟運作格局高度依賴遊客，存在很大風險。國際經濟稍有風吹草動，都會對澳門造成一定影響。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都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提出澳門經濟需要適度多元，讓經濟在依賴博彩業的同時仍然有一定的緩衝空間，當面對經濟危機或全球經濟動盪的時候，不至於受到太大的衝擊。可是，澳門地域狹小，地方相對擁擠，若要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就必須放眼澳門以外的地方。如果說澳門經濟發展的後勁是適度多元，那麼適度多元的後勁則是區域合作。早在三年前，我就在《澳門日報》上呼籲，澳門的發展要看到珠海，要看到區域合作、粵澳合作，甚至更大的粵港澳合作，只有把澳門放在大的區域合作的框架裏面，澳門的發展才能更上一個台階。2011年3月6日，粵澳雙方在京正式

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實際上是為兩地制定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區域協調發展路線圖。在這個大背景下，“十二五”規劃所談及的區域整合是對《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重要推動和支持，國家希望粵澳兩地能高度重視區域整合，加強彼此之間的互補合作，實現聯動發展和區域共贏。

過去，澳門和珠海的關係處理得並不理想，澳門比較關注自己的利益，珠海也有很強的保護意識，兩地談不上經濟融合，就算是經濟交流也只是停留在較低層次。為了更好地融入到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之中，澳門首先應該提高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重視程度。區域協調發展對於土地資源不足的澳門來說，極其重要，澳門也將在這個過程中受惠。所以，澳門必須對區域協調發展抱以高度的重視和積極的態度，加快腳步融合於區域整合中來。對於區域協調發展，珠海已經開始了一系列具體的動作，如廣珠快速軌道交通、珠港澳大橋等基建的興建，積極打造珠海成為珠江口西岸的交通樞紐。相應地，澳門也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主動作出前瞻的規劃，考慮自身該如何參與和融合到區域發展中去。我認為，橫琴開發是粵港澳區域合作的重中之重，是粵港澳區域發展的一場大戲，若能把戲唱好唱響，將會為澳門今後幾十年的發展奠定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澳門應該從戰略的高度看對橫琴開發和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合作發展，並採取一些具體的行動。例如：加長通關時間，最後達至24小時通關；建設軌道交通與區域內其他地方接駁；考慮基礎設施的對接方式；等等。總的來說，就是在做各方面的規劃時都應該考慮到鄰近的地區因素，共同規劃，共同發展，最後達到互利共贏。

懷效鋒：近年粵港澳提出緊密合作，引起了法學界有關各不同法域在融合發展中達到法制統一的討論。現在大中華區實際上存在四個法域，香港受英國法影響，澳門則受葡萄牙法影響，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台灣還是原來中華民國法律體系。從法律上看，四地的法律體系是互相獨立的，區際法律衝突在所難免。在四地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是採取屬地主義，在哪裏投資，在哪裏發生糾紛，都適用當地法律。如果能夠形成聯動的協調機制，加強司法合作和協助，將有利於解決糾紛。事實上各地都已經開展了相關方面的合作。回歸以後，港澳與大陸的合作應當說是很方便的，而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合作也不斷在加強。我認為，隨着經濟的緊密發展，再加上有同文同種的紐帶，交流將會日益頻繁，通過建立協調機制

去促進司法合作是十分有意義的。至於澳門應該如何推進，我認為可以通過在澳門設定一個固定的交流窗口，四個法域的有關方面定期在澳門召開研討會或工作協調會，如早前在澳門召開的世界反貪大會就是一個成功的經驗。除世界各國以外，兩岸四地的法律人士同堂論道，獲益良多。法律的交流也許需要時間融合，但法學的交流則沒有界限，大家可以探討共同關心的話題，澳門完全可以成為這樣的平台。

明確角色定位，發揮自身優勢

澳門特區首次被納入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中，被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其中一部分。受訪嘉賓認為澳門需要及時認清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定位，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把握機遇為促進自己的發展，同時為國家的整體進步作出貢獻。

賀一誠：澳門擁有發展旅遊業的條件，當中其中一大特點是澳門的博彩業，但本來的“旅遊博彩”現在卻倒過來便成了“博彩旅遊”，主次顛倒了，以博彩業成為龍頭產業。必須承認，這些年來澳門的經濟增長離不開博彩業，但是總體來說還是應該以旅遊業為主體，把博彩視為發展旅遊業的其中一個元素。發展旅遊業需要強調多種元素，這樣才能合乎“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澳門不能僅僅是一個博彩旅遊城市，旅遊還應該包括擁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旅遊。澳門要多元化發展，我認為首先要從服務業的多元着手，保障服務業的本土文化生存空間，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澳門的本地特色，才能真正把澳門打造成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現在，整條新馬路和附近街道都被國際品牌壟斷，繼續發展下去，用餐只能到酒店，購物只能到賭場，這樣對澳門是不利的。我之前外訪到新加坡，以前烏節路上很多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小店，現在都是國際品牌店，這些品牌在澳門也看得到，我沒有理由要在新加坡逛這些商店。去一個地方旅遊，就是希望感受當地的本土文化，否則就失去旅遊的意義。舉一個例子，氹仔的地堡街和榕樹頭有很多小吃店及小商店，如葡國菜、泰國菜、澳門菜、手信店等等，沒有大品牌的飯店和商店，但這處卻成為澳門有名的旅遊景點，受到遊客及本地澳門人的喜愛，完全因為這些小店舖才有澳門特色。可是，大品牌、大飯店在澳門越來越多，被拉高的租金導致一些

擁有本土特色的店舖倒閉，如經營多年的“龍記飯店”也關門了。澳門的本土文化正在慢慢消失，我們自己本身服務業的多元都不存在了，慢慢變成了單元，服務都由賭場來提供，對澳門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澳門是市場經濟，我們不可能要求硬要業主把新馬路的店舖以低租金租給賣雲吞麵的小餐館，業主希望通過投資物業獲取最高的回報是合理的。可是，面對這個問題，政府需要認真考慮如何保護營商生態環境，我建議政府把公屋的概念引伸到保護中小企業營商環境中，在政府建設的房屋群裏提供低租金的舖位幫助澳門的中小企業開店，並把需要配置的排污、排煙、衛生、消防、網絡、通訊等管道都按照法律條例的規定架設好，讓中小企業的店舖無論是做餐飲、服裝還是作其他生意，都能合乎規定，馬上拿到牌照進駐開業。特區政府正加緊興建 19,000 個公屋單位，不論是在石排灣還是青洲，應在這種大型的房屋群裏建立一個適合中小企業營商的環境，讓澳門的小店在裏面復興，以住戶作為穩定客源，再吸引遊客。以石排灣為例，媽祖文村和熊貓館就在旁邊，遊完媽祖文化村可以看熊貓，看完熊貓可以一嚐澳門的特色小吃，購買具澳門本土特色的產品，這樣一條文化旅遊路線對遊客肯定有吸引力。政府要有這種前瞻性思維，不能蓋好房子就算大功告成，地下店面的用途也應提前考慮。澳門特區政府面臨的不是財政問題，資產是政府的，訂一個低廉的租金租給澳門的中小企，不允許開大型超市和品牌商店，只允許開小店，這樣才能有效地培育和扶持中小企。營造合適的營商環境只能通過政府行為，因此，特區政府必須要全盤統籌、策劃、規劃及落實。我們要明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先把旅遊方面的多元化做好，這是澳門多元化的出路之一。

現在，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儲備充裕，應該利用這個優勢做好總體策劃，考慮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和計劃。任何一個政府都需要有中長期的規劃，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任期是五年，應該在第一年提出五年計劃，在接下來每年的施政報告裏檢討已達成目標的比例。內地減排也是這樣的，第一年減排很少，後來兩年才逐漸減得多了，因為減排需要整體改造，要經過幾年時間才能有成效，因此不能每年都用相同的標準，應採用平均量來要求。澳門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規劃，特區政府對於在自己的任期內要達成的任務、目標，以及對某一具體方面的工作方針，應該有一個整體規劃。比如特區政府最近提出要投入 100 億元進行醫療改革，100 億不是個小數目，應拿出一套完整的

醫療改革的規劃和方案。從前澳門缺乏資金，在很多方面都有心無力，現在澳門資金充足，但應建立依託長期規劃的機制。

劉藝良：澳門雖然地方小，作為歷史文化城區，文化產業可以作為經濟適度多元的重要方面。在“十二五”規劃、《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強調要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此外，要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既然是世界性的，就要以世界性的標準去建設，目前我們的硬件和軟件配套肯定都還沒有達標，我們要定下一個目標，務求早日達成。當中牽涉到很多方面，包括人才、硬軟件設施的建設、基礎設施建設、通關便利化、交通、服務等。

澳門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優勢，一定要更好地發揮，就是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貿合作的平台角色，“十二五”規劃定稿時非常難得地把它列進去，確立了澳門這一優勢和地位。葡語系國家部長級高層會議論壇每三年在澳門舉辦一次，葡語系國家在澳門也設立了秘書處，每年很多葡語系國家人員來訪後，通過澳門進入內地。我們要清楚地展示澳門的獨特作用——通過澳門成效更好、更富成果。澳門具有歷史形成的環境，土生葡人在澳門生活了幾代之久，土生葡人以葡語為母語，與葡語系國家的感情很深，信任感很強，語言跟感情上具有優勢。另外澳門跟葡語系國家已經建立了長期經貿往來的基礎，互信度高，信心充足。澳門特區政府一直非常重視拓展葡語系國家市場，投入了大量資源，成立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葡國在澳門設有總領事館，葡語又是官方語言之一，這些都是澳門獨特優勢的所在。內地跟歐美的市場關係非常密切，但在金融海嘯期間，歐美市場萎縮得最快。葡語系國家是發展中的新興國家，雖然只有七個國家地區，但遍佈四大洲，它們周邊也有很多友好國家，輻射的範圍很廣，在經濟以外，政治、外交上也具有重大意義。澳門聯繫葡語系國家的平台作用獲得了中央政府的重視，去年溫總理親自來澳出席葡語系國家部長級論壇，發表了重要演講，設立規模為十億美元的“中葡合作發展基金”，認可了澳門的地位和作用。

粵澳合作方面，澳門是一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是微型的、外向型的經濟體，應該融入到粵澳合作的浪潮，拓展內地的市場。儘管在內地創業的開始階段，拓展發展空間是非常困難的，但貴在“堅持”。比如我們澳門澳新公司於 2004 年開始在內地江

門設廠發展生產、銷售澳門手信業，生產澳門知名小吃蛋卷、杏仁餅等幾十種食品，面臨了被侵權、冒牌等眾多問題，市場開拓的過程非常艱難，整個創業過程充滿艱辛，後來慢慢的打開了市場，發展到現在在內地有幾千個銷售點，出口市場則整個歐美及東南亞都有我們的產品。在金融海嘯時期我們還決定擴產，擴建廠房，因為有信心要繼續發展。而且我們的產品在一年內通過了中央、省、市各級的食品安全小組的檢查，在增加消費者“買得放心、吃得安心”的同時，也提高了澳門獨特手信業的品牌知名度，因此，我深深體會到，做任何事情只要找准定位及方向就要堅持，中小企業發展一定要有克服困難的決心和信心，用心去融入區域合作。

青年人有理想、有抱負，我們要給他們機會，給他們發揮的平台。年輕人有創新的能力和智慧，他們的學問是現在教育系統中學習得來的，這些知識跟得上時代的發展，但他們缺乏社會經驗、閱歷有限。經驗的積累是一個過程，行政長官崔世安一上任就強調“傳承創新”，傳承就是繼承優良的傳統。社會經驗是書本上學不到的，要在人生經歷中不斷豐富。現在很多年輕人都表示，沒有人願意給予機會，我認為要給他們發揮的空間和機會，讓他們的知識和理念得到發揮。作為前輩，也要培養他們辨別是非的能力，容許、接受他的失敗，“吃一塹，長一智”。我也是從年輕走過來的，從地級市青聯委員開始做起，再成為全國青聯委員、區、市、省政協委員至全國人大代表。我認為年輕人不要怕艱苦和失敗，“堅持”兩個字很重要，找好方向，找好定位，認定目標，不懈追求。在追求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挫折，但不要氣餒，只要找準了方向就堅持走下去，哪怕再艱難都要堅持走下去，總會成功。政府、民間、社會團體，都應給年輕人多提供、創造發揮的機會。年輕人的品德最重要。年輕人和長輩在理念上會有很大的差距，作為長輩要願意聽取不同意見，虛心接受。對我而言，別人多提一些不同的意見和批評建議是好事。企業亦應培養有能力的年青人加入管理團隊，多讓年青人參與合作機會，這就需要信任他們。作為企業家必須有社會責任，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比如食品企業，最重要是強調質量跟食品安全，兩者是食品生產的重中之重，我辦企業強調要有良好的合作團隊式合作伙伴，管理者追求股東利益、員工利益、客戶利益、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我寄語年輕人，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除了認定方向不怕艱難困苦外，堅持理想和勇於承擔都是很重要的。

李向玉：國家把澳門納入“十二五”規劃，特區領導、社會菁英、社團領袖都應該有很好的認識，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戰略，當中主要有三個層面：①區域合作層面。對澳門的地位與作用，要有清醒的認識。在粵港澳區域合作上，澳門的地位和作用正在突顯，如高等教育領域合作問題，澳門大學橫琴校園的規劃。這個藍圖已經規劃好，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提出“五個一流”的希望，所以特區政府要努力把它落实好，把澳門大學建設為世界一流大學。②海峽兩岸四地層面。要處理好澳門與中國內地各省及粵港澳，尤其是與台灣的關係。一個是粵港澳關係，另一個澳台關係，如果這個層面做好，澳門就能為國家和平統一、中華民族復興而作出示範。③從世界的角度看澳門的地位。“十二五”規劃要澳門打造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國家要澳門打造的是“世界”級，不是“區域”級旅遊休閒中心。某種意義上，我們已經有了初步的基礎，但我們的眼光應當更高遠，站在世界的角度看澳門的問題，這樣的話，澳門就大有可為。

澳門的歷史與現實要求我們有這樣的眼光、智慧和能力去處理好三個層面問題。實現三個層面的三個目標：①生存。通過區域合作(粵港澳)，可以解決澳門的基礎設施、經濟適度多元、環境治理、食品、供水安全、“一小時生活圈”等問題。②發展。為國家，為民族作貢獻。如果能夠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澳門就可以成為“一國兩制”實踐的典範。此外，在和台灣的交往當中，澳門也會有受惠的，發展雙方的旅遊，打造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台灣的教育、文化事業很發達，當然交流是雙向的，如果把內地結合台灣一起交流，那就是對促進國家統一、中華民族復興作出的努力和貢獻。③面向世界。站在世界角度，為提升國家的世界地位作貢獻。雖然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但它的意義深遠，一是經濟獨立自主，不吃政策飯；二是更好地為提升國家的世界地位而貢獻。澳門可以做的事很多，一是加強中國與八個葡語國家的經貿關係；二是加強中國與東亞各國的經貿往來；三是加強中國與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地區的交流。關鍵是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境界和胸懷，只要澳門不眼高手低，一步一個腳印，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就可以實現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雖然澳門是微型經濟，但地位重要，只要站得高、看得遠，就如小卒過河變成“車”。

麥瑞權：我們要認清在“十二五”規劃中澳門的定位。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國民經濟和社

會經濟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其中關於澳門的主要內容是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交流合作，繼續實施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深化粵港澳合作，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同時，明確澳門的戰略定位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在制訂“十二五”規劃時，對澳門的發展給予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而社會普遍認為澳門經濟要再發展，就必須把握“十二五”規劃的大好機遇，為澳門爭取更多更有利的戰略位置，進一步提升澳門的競爭力。因此，在確立澳門將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基礎上，澳門在落實“十二五”規劃時，應將以下問題納入考慮之列。①明確“中葡商貿服務平台”的戰略定位。多年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充分發揮了其應有功能，為葡語國家與泛珠三角地區以至整個中國在金融、經貿等領域的進一步合作提供了優質中介服務，而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能和作用亦逐步獲得確認。但短期內必需增加中葡雙語翻譯人才；尤其是懂中葡語的警察；②加快 24 小時通關的研究。社會基本上都認同 24 小時通關後，人流、物流更快捷，亦對促進粵澳合作及橫琴開發均有推動作用，並有助澳門旅遊業。其實，24 小時通關的議題已在社會上已討論多年，現在粵澳雙方已有共識，以逐步延長通關時間，最終達至 24 小時通關。所以，有必要及早為 24 小時通關作充分部署。③促進環保產業加快發展。環保是世界大勢所趨，是區域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也是區域合作的重要切入點，考慮澳門地少人多的特點，澳門在環保節能方面大有作為，環保產業也大有發展空間。所以，應深入研究和加以扶持澳門環保產業。而且大力發展環保產業，發展綠色經濟，與澳門打造成為世界休閒度假中心的目標是一脈相承的。但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中很多新產業都有提出扶持政策，惟獨環保產業扶持並沒有寫在施政報告上，顯示政府並沒有重視環保是區域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的事實。④推動粵港澳優質生活圈的建設。粵港澳三地政府已達成共識，同意構建一個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將大珠三角打造為可持續發展的宜居區域，從環境生態、低碳發展、空間組織、人員往來、交通組織及文化民生等方面加強合作，從而提升珠三角地區的生活環境，為粵港澳晉身世界級綠色優質生活圈的重要推手。⑤加強港澳合作。港澳兩地同屬特區，兩地各有優勢，故合作空間廣濶。因此，兩地政府應當積極爭取在“十二五”規劃裏攜手出發，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謀求在不同領域優勢的結

合，共創互補雙贏的局面。⑥構建應對人民幣升值機制。隨着國家越來越強大，經濟發展更趨成熟，人民幣升值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基於澳門現有外匯機制，人民幣升值會加重澳門地區經濟負擔，影響市民的生活水平和地區的和諧穩定發展。因此，對人民幣升值問題一定要充分考量和及早部署。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門經濟實現飛躍式的發展，而為確保澳門可持續發展，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對澳門經濟發展的定位，既能切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又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各界應當高度重視“十二五”規劃將澳門的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的層面，而要積極配合和做好建設世界休閒中心這一宏偉目標。

在認清澳門的定位後，就應進一步思考澳門的優勢。①“船小好調頭”。一方面，正因為有些城市的工業發展達至一定規模，機器的設定和要求一時之間難以從環保方面全面一刀切着手處理，澳門的工業經濟發展相對規模小和單一及滯後，所謂“船小好調頭”，故更有條件做一個模範的環保城市；另一方面，澳門產業發展需要專才，如中藥研究、文化創意產業等，澳門可以採取更靈活的輸入專才計劃，以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②財政穩健。澳門特區目前財政儲備比較充裕，特區政府可以透過財政政策提升人力資源和發展環保事業。③法規制定前瞻性。尤其環保方面，屬於新興產業，澳門剛剛起步，可以在法規制定方面，將起點訂得高一點，具有前瞻性。

懷效鋒：我認為中央非常重視港澳的發展，十分尊重澳門的發展定位，從澳門的實際出發，支持澳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支持澳門經濟適當多元化，支持粵港澳區域發展，並提供了很多優惠政策，這些都有利於澳門的長期繁榮和穩定。當中關鍵是如何發揮政府職能，促進澳門的繁榮發展。政府應加大力度解決有關重大民生問題，例如舊區重整、交通完善、環保問題等。特區政府應努力提高效率落實國家“十二五”規劃，促進自身的發展。保持澳門法律體系穩定是必要的，但有些已經是明顯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過時的法律，需要及時修訂，我們相信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但進程還要加快。法律修訂的任務很重，特區政府應當制定一個計劃，集中法律界和法學界的力量抓緊制定和修訂法律，推進法律本地化、現代化，甚至是國際化，關鍵要有積極心態，如果立法沒有時間表，恐怕最終會對政府的施政造成更多妨礙。舉例來說，舊區重整中的拆遷工作中出現那麼多衝突，有些就是因為法律本身

滯後，導致問題久拖不決。例如有關拆遷所涉及的每一戶都要同意的條文明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實際。在民主社會，應以多數人同意、符合公眾利益為最大原則並落實到法律中。堅持多數原則非常重要，否則社會將無法持續發展，難以長期繁榮穩定。

注意可持續發展，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

“十二五”規劃強調發展質量、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受訪嘉賓認為澳門在這個問題上需要和國家同步發展，不能只是盲目追求經濟增長與財富累積，應該注重環境保護和民生建設，讓特區居民安居樂業。

賀一誠：關於強調發展質量、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十二五”規劃中，一共有 24 項指標，12 項是約束性的，12 項是預期性的。澳門的排污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從整個環境來看，澳門的問題在於人流、車流和公共交通的規劃。“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指各項資源分配優化和協調。澳門半島人多擁擠、過度開發，兩個離島的相關配套尚未完善。在這僅有的約 30 平方公里土地上，資源都沒有分配妥當，很難談得上是一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是一個政府需要正視的問題。爲了增加土地資源，特區政府通過填海造地，但填海的區域仍然集中在澳門半島，這樣下去只會繼續增加澳門半島的人口密度，使交通問題更加嚴重。市民的安居問題，並非多蓋樓房便能解決，更重要的是針對人流、車流和交通進行總體規劃。舉個例子，北京不允許把四合院拆掉蓋高層住宅，目的就是要減低人流的密度以及保護傳統的歷史文化，如果北京一、二環內的中心城區全都建起高樓，市內的交通會更加差。澳門的情況也一樣，在黑沙環興建新住宅區，一平方公里能住進幾萬人，但一到上下班時間，幾條馬路全部堵塞，嚴重的交通問題促使市民怨聲不斷。居住問題並非有地有房就能完滿解決，計算人流和車流，對該區域的居住出行環境進行科學評估和論證，才有可能打造出一個“環境友好型社會”。內地每建一個小區，規劃部門都要準確計算人流量和車流量，某些區域爲了控制人流和車流量是不允許造高密度樓房，在這方面澳門缺乏經驗，沒有周詳的考慮，交通擁堵是澳門即將面臨的嚴竣問題，一條輕軌解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不僅僅是“十二五”規劃的內容，也是城市規劃建設的基本概

念，更是澳門面臨的挑戰。

劉藝良：我們的經濟發展很快，年均 GDP 以雙位數增長，人均 GDP 逾四萬美元，踞亞洲前列，但整體而言，還需要加強跟粵港的合作，來提升服務素質、服務態度、交通環境、環保各方面的水平。環保要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的協調合作，比如在鴨涌河的污染治理問題上，因爲澳門沒有水域權，就必須與內地協商合作治理。爲了治理鴨涌河水污染，我們在人大會議上建議了三年之久，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得到解決，就是因爲它牽涉到相當複雜的問題，需要多個跨部門聯手協作。在澳門牽涉環保局、港務局、民政總署多個部門；在內地也牽涉多個部門，它還屬邊防禁區管轄範圍。因此建立聯防聯治的環保合作協調機制要具體、細化落實，與廣東有關方面良好配合、互相支持，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便指日可待。

李向玉：“十二五”規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亮點是注意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型發展，提升各個經濟發展的指數和技術的內涵，減少資源的浪費，減少環境污染。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澳門比較注意環境保護和城市的美化。但在經濟發展中計劃性不夠，城市規劃沒有做好。本來澳門是一個非常美的城市：世界文化遺產，中西文化交匯，歷史厚重，人文景觀多。可是，這些年，因爲經濟的發展需要，想填海就填海，想移山就移山，破壞了澳門的美景，這是沒有規劃的結果。另外，近年的經濟發展引起大量汽車增長，造成了空氣污染。總言之，澳門在環保、水資源方面有很多事要做。

唐曉晴：轉變發展方式，對澳門的啓示頗多，重點是同步做好產業相對多元化，強調民生改善。當然，在這點上，我認爲是相對的。對比一些其他地方，澳門在這方面做得不錯。然而因爲地方小，整個生態地貌自身有很大局限性，例如我們的水域與珠海是相連的，我們的食用水是內地供應的，空氣亦受珠三角大氣候的影響，那麼我們只能靠合作做好工作。對於改善澳門的環境有幫助的周邊地區，我們可以在資金上多做投入，幫助其改善環境的同時提升澳門的環境。當然澳門本土環境亦需要加大投入，澳門環保局應有更多的工作計劃，並把它做好。

與此同時，立法會在制定法律時，亦應將“協議”內容作爲立法指引，澳門立法會在環境立法上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現在歐洲、美國、日本比較先進的國

家，在環保立法方面已經比較前衛了，環境立法構成了對商業、個人活動一定的限制，例如碳排放量的交易等，但澳門目前在這方面工作還沒展開。我們政府應主動的做工作，而民間有這方面知識的人士亦可以積極反映意見，通過社會公眾的推動讓政府接收這方面的信息，推動政府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作為立法議員，我個人也曾經為保護澳門境內候鳥作過發言，希望政府重視有關工作。最近在媒體上看到民署出版公佈了一些相關的研究材料，感覺政府還是比較重視的。

麥瑞權：首先，國際旅遊休閒中心需要一個優美的環境。環境保護不單是一個地區公認的競爭力主要元素，更是構建“友好型社會”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試想，如果澳門的空氣等環境因素都很糟糕，旅客將不願光臨澳門。前年澳洲政府曾警告國民不要去香港的個案，可以警惕大家，因為香港當時的空氣污染會影響其市民的健康。所以，不管是澳門旅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還是構建“友好型社會”，抑或是構建澳門長遠的核心競爭力，澳門在落實國家“十二五”規劃中都應着力於環境保護。

第二，澳門地小人少，推行環保顯優勢。從現實情況來看，澳門目前也具備發展環境保護產業的條件，並且此前提到的澳門種種劣勢，在發展環保產業中將成為澳門無可比擬的優勢。與周邊地區相比，澳門歷史較短，並非由工業城市發展過來，而是由小漁村轉化為世界都市，因此，澳門還依舊保留着不少未被污染的產業或地區，澳門並不需經歷“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徑。澳門是彈丸之地，人口總量也相對較少，在微觀而有限的環境中投入適當資源，提升旅遊環境競爭優勢，其代價是值得的；加之，澳門 GDP 逐年增長以及庫房盈餘過億，澳門更具備資金充裕的優勢。此外，澳門雖小，但引進了世界最好的環保設施，有 5 座污水處理設施以及 1 個垃圾焚化中心，在區域合作中，更可以透過環境保護回饋周邊地區，因為環保沒有邊界，沒有利益衝突。通過環境保護，加大對環保的資金投入，發展周邊地區的環保事業，設立環保基金，不僅對區內市民的發展，還是對周邊地區的回饋，都意義深遠。

第三，環保工作離不開與周邊地區的協調。區域合作，構建友好型社會，並非一朝一夕，需要一代甚至兩三代人的共同努力。因此，提升年輕人的環保意識，是發展環保產業的重中之重。例如，在橫琴開發校園建設中，一流大學的打造目標尚遠，但建設無煙

校園，建構一流的環保型大學卻容易實現。橫琴校園的建設是從頭開始，可以突破舊有歷史的限制，較有條件達到。此外，還可以在校園中推廣垃圾分類、垃圾不落地政策。目前，在全世界華人中，垃圾不落地政策實施最好的是台灣，他們在八年時間內將中華文化的道德操守和精髓發揮到社區，目前台灣每條街巷，都有垃圾車，每棟大廈下面有義工回收垃圾，並將垃圾分類，循環使用，他們還實施用者自付政策，個人所用的垃圾袋均要購買。台灣可以做到，培養澳門下一代精英的澳門大學也可以做。

郝雨凡：經過過去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澳門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不應該再僅僅關注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累積，而應該更強調發展質量，建設一個“環境友好型社會”。

澳門回歸以來經濟超速發展，但主要是集中在博彩行業。大量的外資引入，酒店建設和配套設施，讓澳門形成了一個圍繞博彩業迅猛發展而產生出來的表面繁榮格局。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促使社會財富迅速累積的同時，也給整個澳門社會增加了很多負擔，交通、物價、房價、醫療、收入分配等均出現了不合理的情況，影響着澳門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澳門整體經濟在博彩業這個龍頭產業的帶動下取得了跳躍式增長，GDP 總量自回歸以來增加三倍有餘，但社會財富過於集中於小部分群體，未能合理平衡地回饋給整個社會，而博彩業超速發展付出的社會成本，卻又未能同比例分享發展成果的社會大眾承擔。現在，民生問題已經逐漸浮上水面，似乎成為居民心中壓倒一切的問題，其重要性開始蓋過單純的經濟發展。

因此，在目前財政滾存充足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應該重點考慮加大民生投入，從戰略性的高度去思考保護環境、改善民生、建設一個環境友好型社會。“十二五”規劃強調發展質量、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恰好督促特區政府把這個方面的施政列入日程。如果說過去十年特區政府關注的是經濟效率，那麼接下來就應該更注重民生，重點考慮如何發展有質量的、可持續的澳門經濟，以及如何建設一個環境友好型的、具有人文關懷的社會。

重視澳門文化底蘊，提高文化軟實力

“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國家應該加強“文化軟實力”，澳門作為一個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應該

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提高軟實力是一個迫切的課題。受訪嘉賓認為發展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加強澳門學的研究、以及積極發展澳門的教育事業是提升軟實力的出路。

賀一誠：澳門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文化人、專家學者也有很多。要打造“文化軟實力”，重點是要找對屬於澳門自己的路，任何一個產業，都要有正確的道路，盲目的跟風是行不通的。我認為，澳門應該利用自身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點，建立獨有的文化特色，要好好利用這種特色開展文化產業，如影視產業。

四百多年的“混血”歷程，澳門擁有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質，也見證了歷史的變遷，著名人物、典故和事迹多不勝數，這些都能成為很好的影視拍攝題材。利馬竇是著名的傳教士，澳門是他進入中國、學習漢語的地方；鄭觀應作為中國革命的先驅，一直世居澳門；孫中山也曾在澳門行醫；康有為、葉挺等名人都在澳門生活過，他們是澳門的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澳門可以通過這些題材拍攝出很好的影片。影片不一定全在澳門拍攝，只要背景在澳門，故事源於澳門，有一部分鏡頭在澳門取景、利用澳門的獨特景觀和文化氛圍便可以；也不一定要完全由澳門製作，在內地製作的話成本不到一千萬就拍出來，通過全國播映，拍得好的話，內地的創作人就會到澳門來尋找靈感，漸漸就能把澳門變成一個有文化底蘊的創意產業基地。其他方面的文化創意發展可遵從自由發揮、百花齊放的規律，比如通過區域合作，在橫琴建個藝術村，政府投資一些資源，讓內地年輕的藝術家在那裏發揮創意、進行創作，當年深圳的大芬村油畫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集中做一個行業，讓它有所產出。總而言之，目前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總體發展方向還沒有整合，還不清楚路要怎麼走，但我深信，澳門必須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不能只是跟着人家後面走，這樣是沒有出路的。

李向玉：“文化軟實力”一般是指話語權，最早提出的是美國。相對於硬實力的軍事、經濟而言。從美國來看，其文化，如果跟中國五千年文化相比，它是幼童，沒法比。但是，美國文化不能小看、不能輕視，它的文化體現在電影、可口可樂、的士高音樂，在全球裏無處不在，深受年青一代喜歡，這就是美國的軟實力。美國另外一個突出的軟實力是高等教育。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都是世界一流大學。正是美國

有世界一流大學，才有一流人才，才有美國軍事、政治、經濟的強大發達。由此可見，教育是美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的根基。

澳門的文化歷史比美國還要長。以葡萄牙人 1553 年到達澳門為始，澳門已有幾百年文化史，所留下的中西方交融的文化寶藏非常豐富，加上澳門是一個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地方，澳門人自己創造了澳門的歷史文化，如嶺南文化、閩南文化，可以說世界很多優秀的文化留在澳門後，才有了今天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澳門還是世界名人薈萃之地，如利瑪竇、湯若望、賈梅士、湯顯祖、孫中山、鄭觀應、冼星海等都在澳門留下過足跡，如果把這些名人帶來寶貴的精神財富，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包裝，拍成電影、製成動畫，相信將會增強澳門的軟實力，這是大有可為的。

溫總理來澳門時，提出要辦一流教育。辦一流的教育要求對澳門大學而言已經明朗化，它的藍圖已經繪制好，那麼澳門理工學院該怎麼辦？若我們不能給出我們的答案的話，我們就是麻木不仁，落後於形勢，不識時務。所以，澳門理工學院已經制定了十年發展計劃交給特區政府，我們提出的辦學理念是：成為一所“地方特色鮮明，服務澳門發展”的大學。澳門大學要發展為國際化研究型大學，而澳門理工學院就要朝着地方性大學發展。其中特色：一是葡萄牙語，我們旨在將澳門理工學院打造成為全中國、亞洲的葡語教學中心；二是博彩培訓的特色，我們要將澳門理工學院打造成博彩教學與研究中心。今天的大學要跟上世界潮流，要強大，有兩大工具不能沒有：一是英文，一是電腦。當然，澳門理工學院本質上是一所中文大學，加上學生大多數來自澳門及內地，對中文基礎的要求自然很高，再加上上述兩大特色、兩大工具配合下，澳門理工學院可望成為一流大學。

唐曉晴：澳門基礎教育辦學團體有不同元素，辦學文化各自不同，基礎教育的辦學比較多元，其特色之處在於無統一的評核考試，各學校自主展開招生考試，對自己的教學質量進行評核。這種多元的、沒有一個統考作為指揮棒的培養方式、培養理念對於人才的培養是有好處的，然而，它也會引起一些憂慮，例如，中國千年的科舉傳統強調通過統一評核的考試體現社會公平，這是一種教育理念。無統一標準難以判別學生在同一領域的水平等等。這對競爭非常殘酷的社會來說，會對形式上的公平構成一定的障礙，因為工作、學習機會與學習成績有一定關係。但是如果從培養人的素質，這樣一種素質教育、社會教育的角度

來說，澳門的基礎教育反而有他的特色，因為個人有自己的選擇。不同的教育途徑，都能出人才，不同的文化教育模式亦可以培養出不同人才，要看我們有甚麼價值目標追求，對於教育是基於甚麼期待。不一定從考試裏面挑成績最好的就是好的，不同的制度裏培養出不同的人，澳門應該包容，可發展有特色的多元教育模式。

麥瑞權：本人建議從以下幾方面着手：①開設中專教育、職業技術學院。現時，有言論認為，澳門要辦這類學校，不符合經濟效益和報讀人數難以確定。本人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果基於困難和效益限制而使澳門沒有工業學院，而使澳門人力資源短缺、斷層、失衡，澳門將得不償失。正如我曾經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可以購買整個課程回澳。特區政府現時庫房比較充裕，本人認為政府可以外包課程培養專才，例如醫科、工業設計、建築工程等。②公民教育。現在學校，在新的控煙法中，沒有禁止學校公共地方吸煙，為甚麼政府不去做無煙校園、垃圾不落地？如果校園允許吸煙，垃圾通街可見，談甚麼軟實力？特區政府應該加強公民教育，多從提升人力資源、環保方面入手，透過立法，實現無煙校園和垃圾不落地。③開設多元化課程。目前，澳門有不少大學，但課程選擇不多，例如沒有醫科，大多以工商管理、電腦和語言翻譯為主。如果開辦一個新課程因不符合經濟效益而不去做，那麼澳門的軟實力將無法提升。建議特區政府開設多元化課程，以填補社會發展需要。政府可以採用外包課程的形式去做，即使外包費用昂貴，也要去做，這方法是否可行，可先作調研評估。補充一句，何謂真正的文化軟實力？大家看看時下日本發生九級地震，引發特大海嘯，社會仍井然有序，這就是文化軟實力的表現之一。

郝雨凡：“十二五”規劃提出“文化軟實力”恰逢其時。經過多年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硬件已經有了很明顯的改善，在這個基礎上把營造“文化軟實力”擺上日程，作為政府的主要關注方向，此舉絕對是應該的。在澳門，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也一樣。澳門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是“賭城”，我個人認為這樣的形象比較單薄。無可否認，博彩業是澳門主要的經濟支柱，博彩、娛樂、購物有助於把澳門打造成國際旅遊休閒中心。但要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到澳門來休閒娛樂，絕不是光靠賭桌和單一的博彩業。我們必須要發掘這個城市所獨有的文化和內涵，讓世界各地的遊客

覺得非來這裏看一看不可。事實上，澳門擁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和內涵，只是這方面的特點一直沒有被凸顯出來。

澳門是一個有歷史和文化的地方，其底蘊是幾百年來中西文化交融碰撞而形成的，是澳門所獨有的。這種特色，與香港、中國大陸或西方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同。澳門應該充分利用這種特色，努力營造“文化軟實力”，只有精心挖掘、細心利用和用心發展“文化軟實力”，才能真正推動澳門成為國際旅遊休閒中心，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這是城市發展的突破口。可惜，過去我們對這方面的關注較少。讓一座城市真正偉大的，不是財富，而是文化。有些城市很有錢，但卻沒有文化沉澱，不管如何挖掘，其內涵仍然是空洞的；相反，澳門擁有能讓她偉大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可是卻一直沒有好好挖掘利用，這是很大的遺憾。

我一直支持要建立並推廣“澳門學”，即研究澳門歷史中所蘊藏的各種文化的包容、互動、共榮與新生，研究這種互動相生的文明形態，從而揭示出人類文明互動發展的澳門模式，又為今天世界解決各種民族衝突提供重要的啓示。澳門正在蛻變成爲一座頗具知名度的國際都市，但澳門在國際社會中的賭城形象太過鋒芒而文化形象相對薄弱，這不利於澳門的長期發展。爲了真正把澳門打造成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我們需要提升澳門的城市品位和文化內涵，挖掘澳門文化的寶藏。但現在，我們是看着這一寶庫，卻找不到開啓它的鑰匙。可以說，“澳門學”就是這把鑰匙，引領我們尋找澳門獨有的文化，讓我們能夠打開寶庫，並把其內涵發揚光大。

懷效鋒：關於“文化軟實力”的問題，我主要想從教育的角度談談自己的想法。雖然我來澳門的時間比較短，但同樣非常關注“十二五”規劃以及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等有關澳門長遠發展的政策。我認為政府高度重視高等教育，並將之視爲一種產業來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實上，現時各地一般都將高等教育視爲一種產業。“十二五”規劃中提到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我的理解是，除了博彩業是澳門的一個主業外，其他產業也應有適度發展，絕不能單純依賴博彩業。儘管中央對於大陸居民來澳旅遊休閒的政策是穩定的，但澳門對外依賴性很大，受制於周邊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和變化狀況，如果政策放得寬或者周邊經濟狀況好，當然來的人可以很多。然而，一旦周邊相關產業狀況改變，包括一些價值取向或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人們的心理狀態改變，又或者發生突發

事件，將會影響澳門博彩業，所以過分依賴博彩業有如靠天吃飯，澳門難免處於被動位置。

將高等教育視為一種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和會展業協調發展完全有可能。首先從澳門自身來看，高等教育有發展的需要。很多中學生畢業以後便開始就業。從眼前現實的角度來看，早就業當然對居民在經濟上有一定好處，但從長遠的角度看，則有礙於整體人民文化素質的提高。政府可以適當地作一些引導，例如給予教育補貼，鼓勵學生大學畢業以後才就業。澳門現時已經推行了 15 年免費教育，那麼大學階段是否可以考慮多給予一些補貼，鼓勵年輕學子入讀大學，提高青少年的素質，同時也可以延緩就業週期。從長遠來看，這種對高等教育的補貼更具前瞻性，對社會發展更有積極意義。其次，外埠的學生入讀澳門高校，學生及其親友在澳門的消費也很可觀。另一方面，限於澳門自身的資源和地理環境，已不太可能發展更多工業。因為有環境保護方面的要求，也有如水、電等資源方面的制約，發展大規模的工業存在困難，而高等教育發展成爲一種產業是有空間的。首先，澳門是一個國際城市，作爲東西方交流的平台，可以更好地吸收西方高等教育的經驗和師資；也可以作爲大中華區的交流平台，吸收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地的教育資源，澳門可以辦開放性的教育。當中，澳門的高等教育面臨的主要還是師資力量薄弱的問題，無論理科、工科、文科等，師資力量都比較弱。政府需要提供更多優惠政策，如給予來澳執教的各方師資比較高的待遇條件，符合條件的可以讓他們在技術移民的申請上提供方便，這些政策都可以也應該由政府主導。因爲辦好教育首先要有師資，世界上著名的大學都是因爲它擁有知名的教授。學校因有著名的教授任教而具知名度，吸引學生慕名而來。從澳門的情況看，不僅要是吸引有影響力的教授，同時也要吸引一些有潛力的中青年學者來澳紮根，這樣才可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而這需要政府制定更多有吸引力的政策配套措施。這樣，大學擁有優質的師資，前來學習的人就多了，可供選擇的生源漸漸增多，大學可以從中選擇優秀的學生，名師良才形成良性互動。這個思路是先擴大量，然後提高質，那麼教育的規模就能上去了，而且文化軟實力的影響力也會逐步擴大，逐漸成爲一個產業。澳門如果在高等教育上能有長遠規劃，重點扶持，使其成爲產業完全是有可能的。這與“十二五”規劃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們看到澳門大學橫琴校區以及中醫藥產業園區已在興建，我認爲也可以在橫琴興辦澳門高等教育的

產業園區，讓更多的大學在橫琴發展。如果有優秀的師資，學校產、學、研相結合，可以相應地開辦相關的企業，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採取這種模式並有成功的經驗，澳門也可以借鑒。高等教育可以吸引高科技人才，把高等教育作爲一個產業來辦，可以達到經濟適度多元化，可能比較容易見效。高等教育只要有師資這個關鍵因素，其他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高等教育成爲投入最少，產出最高的一個產業，所以重點發展高等教育對於澳門的可持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需要在高等教育方面加大投入。政府已經有很多的財政積累，但用於教育上的投資還遠遠不夠，有必要作出具體的財政規劃，設定每年高等教育的支出佔政府財政積累的比例，以及多少年後要達到甚麼樣的規模。不論是公立的還是私立的高等院校，政府都應當加大扶持的力度。從國外來看，私立學校的質量非常高，而且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佔有重要席位。澳門也可以做到，因此我呼籲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重視私立大學的發展。

從目前澳門的整體狀況來看，與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人才就業問題，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引入競爭機制。澳門的博彩業已經引入了競爭機制，放開了博彩准入資格，非但沒有影響原來的澳門博彩業發展，反而對博彩行業起到了促進作用。所以人才就業方面也應該引入競爭機制。如果沒有競爭機制，對於社會的均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利的。就我所從事的領域來看，司法職業的准入制度也需要引入競爭機制。我們知道世界上主要國家基本上都有統一的司法考試。實行聯邦制的美國以州進行司法考試。德國的大學法學院學生的畢業考試就是第一次司法考試，實習後再進行第二次司法考試。中國大陸近年實行司法考試後明顯地爲司法界補充了大批合格的人員，司法人員和律師的素質也有所提高。對於澳門來說，法律人才的匱乏不僅僅體現在法院和檢察院，其實律師界的缺口也非常大。澳門的律師手頭上積壓的案件很多，居民所得到的法律服務也是不足的。與其他國家相比，澳門律師隊伍佔總人口的比例來說還是偏低的，如美國平均 300 個人中能有 1 名律師。如果算上常住的非本地居民，目前澳門大約是 3000 人只能有 1 名律師。之所以不能及時作出補充的原因，主要是沒有統一的司法考試，法律職業准入缺少客觀統一的標準。目前的情況是只有澳門大學的學生比較順利地進入到律師的候選隊伍中，而在澳門科技大學以及其他院校接受法律高等教育的學生在准入條件上還存在着障礙。這當中存在有關方面對相關法律的不當解讀。澳

門《律師通則》第 19 條(求取職業)中規定,“報名為律師之條件為:澳門之大學法學士或受本地區認可之任何其他法學士;完成律師業實習。”該條第 2 款規定“非澳門之大學法學士”須根據澳門律師公會規定完成其適應澳門法律體系之先修課程。既然法律規定了“澳門之大學法學士”無須先修即可以進入律師實習,那麼只要是在澳門之大學的法學院畢業的學生就應當有准入資格。可以預見澳門的高等教育處於不斷發展的進程中,將會有更多的大學設立法學院,因此建立一個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勢在必行。這樣不但可以用來檢驗每所高校的法學院的教學質量,而且可以為更多在其他國家或地區接受過法律高等教育的澳門居民提供就業的機會。因為有了統一的司法考試,可以從命題上把關,確保在澳門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士掌握應有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我認為引入競爭機制對澳門作為一個開放型的、國際化的城市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今天我重點談談這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要高度重視高等教育並增加投入;第二是引入競爭機制,更好地吸引和儲備人才,特別是法律人才。

堅持依法施政,保障民主人權

“十二五”規劃要求“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當中涉及到民主與人權狀況的問題。受訪嘉賓對澳門的民主及人權狀況作出評估,並認為特區政府通過依法施政,尊重市民的聲音,比較好地保障了澳門市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

賀一誠:澳門人的知情權基本上比較充足,澳門居民的人權也擁有很多保障,我們也擁有遊行、罷工的權利,權利廣泛而且得到保障。比如立法會議員可以監督政府行為,讓政府有效地依法施政。但不管是直選、間選還是委任的議員,都要對自己的個人行為負責。法是從立法會來的,是立法會通過的,依法施政的前提就是立法會立好法,這是第一個前提,確保法律沒有出現太多漏洞,這才是立法會最重要的任務,法律質量好了才能作出有效監督。澳門現行生效的法律、法規數以千計。執法者永遠能在法律中找到維護自己的一條,卻看不到監督的一條。找到對自己有利的條款,就宣稱自己是依法行事、依法施政。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善用中央授予的、只有在兩個特別行政區才有的權利——立法權。

澳門的法律獨立性很強,雖然所有立法均要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但是只要與憲法、基本法不衝突,就沒有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要提高法律的質量。此外,我們要監督政府依法行政,如我在前面提出的公屋店舖規劃,政府不作考慮並不算違法,只是現在不考慮,將來可能會出現很多問題,如果在規劃階段便能精益求精,效果會更好。“法”包含了何謂違法、怎樣執法、如何理解法三個層面,這三者應有機結合,不能僅僅要求不違法。

在建立和完善法律體系方面,中國內地已經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對澳門的法律改革工作有一定的啓示。內地的法律體系分為三個層次、七個部門,包括 236 部法律,逾 690 個行政法規,超過 8,600 件地方性法規和單行條例。法律體系有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法律的統一性,第二是法律的健全性,主要的法律我們都齊全了,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律體系的任務已經完成。接下來,我們在修改法律的過程中,將會碰到很多深層次、複雜性問題。現在我們制定的都是原則性、框架性的法律,下一步則要細化。如民法典,它不僅是一部法典,還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所以要先從民法典入手,這是我們立法人的方向。《中國民法典》已出了第一稿,九屆人大最後一次會議審議過了超過 1,000 條的第一稿法案。

澳門的法律數量太多,問題也不少。第一個問題是法律的歸類不清,澳門有五大法典,支架全部齊全,但是法律如何歸類,一部法律應該歸屬哪一個系統和法律部門裏卻一直沒有嚴謹的規範。第二個問題是法律的清理不夠及時,近兩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清理了很多不合時宜的、與後來制定的法律有明顯抵觸的法律條文,不清理的話無法系統分配到法律部門。法律一天不作廢,一天都是有效的,將其法律效力廢止了,才能按照後來的立法執行,才能更有效地監督政府。回歸前澳葡政府實行雙軌立法,很多本不應該是法的,如由澳督頒佈的法令被當作是法律,這些法律都需要清理。同時要進行法律整合工作,把法律部門分清楚,以後就有法可依。不然的話,現在有幾千個有效的法律、法規和法令,單純就回歸後澳門已多了幾百個法規了,這是很危險的。事實上,法律不是越多越好,它是一個核心規範,不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一個茶杯、一部電話都立一個法。在澳門,很多事項在民法、商法等法典裏都有清楚規定,不需要再另訂多個單行法律,互相“打架”。我感覺到法律“打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行政部門永遠可以在幾千件法

律條例中找到能為自己辯解的條文，永遠“有法可依”。我認為，澳門的法律改革，一要提高立法質量，二要做好法律清理工作，三是全面整合法律並系統地歸類到相應的法部門，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法律體系的結構問題。

至於澳門的民主發展和選舉辦法的修改，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必須認真對待。它是由基本法規定的，要考慮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即使要像香港一樣逐步邁向民主發展及選舉之路，也要堅持循序漸進原則，因為澳門地方小，容易出現種票現象，這將會產生很多後遺症。一個社會的發展，不是靠全民直接選舉領導人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正如陳水扁是直接選舉出來的，最後卻被發現貪污貪得如此厲害。所以，絕對不是社會上一些意見認為的有了選舉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重點在於需要提高政府與公務員依法施政的水平及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唐曉晴：首先，我個人覺得不宜把這類話題定為禁忌敏感話題，澳門是開放的城市，談論這種話題非常正常。事實上，澳門已有民主社會的結構，現在的問題在於如何加強公民的知情權、政務的公開以及更多的選舉參與。我認為，澳門民主的發展需要有一個秩序，社會有自身發展規律，而不同的社會也會有自身利益結構，如果僅反映出一小部分人的意見，這並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也不符合民主的基本理念。

目前澳門的經濟還可以，自然有不同的利益團體，有不同的社會階層，對本階層的利益有不同訴求。那些訴求可通過不同的渠道去磨合，在澳門渠道是有的。澳門的媒體、機構、團體文化，社團運作多年已達成並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對澳門的政治生活是非常有用的管道，多年來都是在現有框架下去發展。在居民生活穩定、經濟不錯的時候，沒有必要挑起原本就沒有的矛盾，更不要為一己私利打破運行得不錯的秩序。澳門現有社團運作糅合不同階層利益的模式，也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些價值。我相信，我們現在就已經生活在民主社會中，談民主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完善的問題。民主的發展不是要完全否定現狀。我們的社會本身就是民主的社會，公民有很多渠道反映意見、追求自己的利益，至於渠道能否改善或增加，這是一個量的問題，而非有與無的問題。

其次，民主的推進需要一個過程，不同的社會有自己的發展方向，政府的施政已逐步公開，施政透明度亦逐步提高。在立法方面，立法過程中很多程序業已公開，這是一個積極的方向，未來的公民參與也會

進步與增加。而在司法方面，可以說目前澳門的司法制度、司法系統正處在比較好的運行狀態，司法獨立得到很好的保障，我們應該珍惜並捍衛司法獨立，而不應該干預司法獨立，然而在司法領域的公民知情權與監督權的保障方面，我認為仍存在進一步提高的空間。例如，我曾在立法會多次提出，司法機關需做到判決公開。司法權利是非常絕對的，我們要維護司法獨立，就需要捍衛司法權威，但司法權威正當性的建立，需經歷公眾判斷與認同的過程。而通過關係人、學者、公眾對這個過程進行研究，可分析司法機關是否觀察到社會的一些意見，是否對公民的價值理念有認同；以及法官通過公開判決，讓公眾看到法官說理的過程；民眾自己可以作出對比，判定司法公正是否實現，這些都要求司法機關公開判決。需知道，司法權威不能靠神秘主義來保持，判決公開更有助於維繫司法權威，進而保障司法獨立。

此外，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價值和結構，民主的建構是為了符合社會的發展。澳門社會是以基本法為基礎構建的，基本法規定澳門是中國的一個部分，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如何處理中央與特區以及特區與周邊地區的關係，在民心民情上都不可逾越基本法所構建的大框架。在這個大框架內，我們還要考慮澳門自己的經濟生態、社會生態。事實上，《澳門基本法》本身就是我們社會秩序的保障。在這樣一個有序務實的社會中，民生是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而民主需按社會發展情況改變，一邊討論一邊融合。我們可以讓民眾在討論的過程中決定未來走向，我感覺這是比較容易讓民眾接受的一個改變過程。目前，澳門雖然產業單一，但就業穩定，經濟良好向前發展，在這種狀態下，澳門的社會結構優化可以穩定的步伐向前推進。

麥瑞權：在我看來，目前澳門的民主與人權保障方面發展不俗。首先，澳門的經濟發展比香港好，民主與人權保障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是發展好經濟。眾所周知，澳門回歸以來的經濟都以雙位數增長，人均GDP更超越香港、日本，成為亞洲第一。西方的民主發展主要得益於工業革命，即經濟的發展，人們有工做、有飯吃、有閒餘去思考民主，所以西方的民主比東方民主較早發展起來。然而，大家要明白，這種民主的生成不是必然的，是完全基於經濟創造下產生的，沒有強大的經濟生產力，這所謂的民主與人權保障只能成為空話。

第二，澳門不應該仿效香港的民主發展路。香港的民主發展路是老是壞暫不作評論，但澳門不應該仿

效香港的民主道路。任何社會制度的產生都是為了當地區的人群生活素質提升而建立的，香港以前生活環境比澳門好，多個領域都傾向學香港，但回歸後的今天，澳門比香港更加好，這說明澳門的制度上和操作上比香港好。再舉一個例子：2010年是東西德合併二十週年，有西方學者做出一個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東德人認為合併前的東德社會制度及生活質素都比合併後的所謂民主生活方式好，這正好說明民主的推動若果不是為市民的生活帶來改善的話，尤其是不是循序漸進的話，市民不一定得益，不一定能接受。此外，我們要思考何謂民主。民主起源於希臘，是當時奴隸主階級的產物，主要集中於歐美地區，但民主模式皆不同，到現在也沒有一種標準模型，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民主特徵和限制。所以澳門也應該走屬於澳門的民主路，根據自身的客觀條件和人文素質去發展民主道路，不應肆意地將民主凌駕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之上，如果是這樣，這不是民主。

第三，民主應當包容。有一些自稱民主人士常批評別人不夠民主，當其他人提出一些反駁時，就認為其他人不民主，其實他們本人就是不民主，是民主獨裁的代表，打壓民主，這是民主被亂標籤現象。簡單來說，就是一些人被標籤為民主之士，他的話就是代表民主，其他人的話就不是民主。澳門歷來是一個和諧包容社會，這本身已形成了民主包容的獨特成分。應當包容社會各界不同聲音，這就叫民主。

第四，澳門是民主社會。《澳門基本法》有明確表述，澳門居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遊行權利。事實上，回歸以來，澳門居民上街表達訴求越來越多，這就是澳門民主真正的體現。

第五，社會上有人追求“形式民主”。民主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綜合性工程，不是只靠宣傳就可以有成效的，它的主要條件是建立在社會經濟發達的基礎上，沒有生產力，就很難去推動民主。現時社會上有部分市民，盲目地要求一些不切實際的民主，甚至是一些抵觸澳門社會傳統習慣的民主訴求，這是對民主的不理解。從西方民主理論上的解釋，市民尤其是年青人要追求民主，首先，要通過學習，充實自己，發展自己，貢獻社會，成為社會棟樑，這個過程亦是推動民主，創造經濟績效的人亦是推動民主的人。如果年青人單在思想上想爭取民主，實際上對推動民主功效不大，因為如果不首先充實自己的知識，當民主之火到來時，不但沒有能力接住民主之火，甚至會把真正民主之火弄熄。故民主是要在市民普通有一定知識水平的基礎上，來認識民主談論民主才現實。另一方

面講民主，首先要對別人有包容性。

由此可見，民主要建基在經濟基礎上，西方民主理論指出經濟發達的地方，民智高的地方，推行民主的成功率較高，同時經濟均富的地方，大家追求民主之意向較統一。主要理由是大家都希望能在公平、公正、公義的社會下生活，目的是他們需要有安全或社會去保障他們的勞動成果。澳門並不是一個極權國家或地區，在《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之下，我們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及渠道去發揚民主，大家都可以用一個海納百川的態度去探討民主和實行民主，但不能因為一少部分人要推動他們認為的所謂民主而影響其他市民的生活秩序。這樣所謂推動民主的方式本身並不民主。

郝雨凡：“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涉及到的的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問題，包括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市民的政治表達權利以及政府與民間的政治溝通。澳門面積不大、人口不多，但治理的難度並不低。過去十年，澳門經濟高速增長，社會財富迅速積累，同時，民眾對社會現狀的憂慮和不滿也在逐漸上升，對政府的期待也不斷提高。民眾對政府的期待包括很多方面，如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妥善管理財政盈餘，提高財政透明度，推進各項民生規劃，加強政府的廉政建設等。博彩業飛速發展加重了各種社會成本，也使各種社會問題日漸凸顯，民間希望特區政府能有效地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這除了考驗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能力外，同時也考驗了政府是否有能力有效地與社會溝通。要解決好政府與社會的溝通問題，首先就是要“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

第三屆澳門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崔世安的帶領之下，比較重視上述問題。2010及2011年兩份施政報告的主旋律，除了圍繞處理民生問題之外，就是強調要建立“陽光政府”和實行“科學施政”。這反映出，政府一方面希望努力回應市民的各種要求，另一方面也將積極探索更有效的“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的一些方法，嘗試建設更加民主、更加親民、更加科學的治理體制，引領整個澳門社會向前發展。目前，我們看到政府已經採取的具體舉措包括，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並在各個局級單位設立公共關係協調員職務；成立政策研究室及多個委員會，加強與市民的溝通等。可見，特區政府在“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方面是有作為的。

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現在民間對政府的期待

與政府真正能夠做到的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如何進一步回應居民的需求，是特區政府應該重點考慮的。不過，與鄰埠香港比較起來，澳門的大眾政治文化比較溫和，不會走極端走偏峰，也不會為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妄顧大部分市民的利益。社會上有影響的團體清楚，只要他們發聲努力爭取，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社會群體的聲音和需求比較容易會被政府照顧到。通過這一方式，特區政府能夠較好地考慮到各個社會團體的利益，反應也比較快。我認為，這一點算是澳門特色，應該繼續保持。

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推動國家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本方針，也是基本國策，澳門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在繼續發揮這項制度優勢的同時，亦應該進一步思考在推進兩岸關係、促進國家和平統一方面可以起到的作用。受訪嘉賓認為，澳門的發展離不開“一國兩制”，同時亦表示，澳門應該發揮正確實行“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推動兩岸的深度交流。

賀一誠：兩岸關係方面，中央與台灣是直接對話很多，特別是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兩岸溝通得比較好。台灣在經濟上與內地的聯繫已十分密切了，這兩年大陸開放了赴台旅遊，對台經濟的支持力度很大，加之 ECFA 正式生效，兩岸經貿會進一步走向互利互補。雖然現在兩岸的關係緩和，但澳門推動兩岸交流對話的大方向是不能改變的，今天是國民黨執政，不能代表永遠是它執政，所以我們還是要做好兩手準備，澳門要繼續發揮“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從政治角度看，“一國兩制”應該要給人信心，如果澳門社會每天吵吵鬧鬧，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別人就會懷疑“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成功的表現不只是 GDP 增長了多少，還應該包括澳門居民的滿意度如何。全國人大常委會做了 15 個專題調研報告，當中有一項講到中國的福祉指數，這個調研報告做得十分好，讓老百姓親自填寫對生活環境、交通狀況等感受，科學地計算了 12 個省份的 GDP 和福祉指數的相關性。GDP 提高了，居民也快樂了，即福祉指數提高了。GDP 增長、福祉指數提高，這些都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澳門的生活環境很寬鬆，居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基本權利得到保障。執政者通過依法施政為居民造就

幸福的生活環境。所以，我認為澳門在“一國兩制”下要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造福澳門居民，給人以信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

劉藝良：澳門“一國兩制”的優勢應該要更進一步的發揮，我們要珍惜“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在兩岸和平發展方面，發揮獨特作用。在溫總理的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了發揮港澳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獨特作用，說明中央認同、肯定港澳獨特作用和地位，我們要珍惜，不辜負中央的期望。澳門在兩岸關係確實擔當了重要角色，春節包機的共識是在澳門達成的；一機到底也是在澳門玉成其事。澳門的氛圍、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對於台灣民眾來說比較容易夠接受，歷史上澳台兩地民間的往來一直很密切，澳門在回歸前就給予台灣民眾眾多出入境優惠，如台胞通道，回歸以後還得到保留，讓台灣同胞感覺到“一國兩制”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有強大的生命力。澳門的博彩業不僅帶來經濟收益，政治影響也很大。整個中國內地都不允許發展博彩業，澳門回歸以後，不僅沒有限制博彩業的發展，而且讓它更國際化、規範化、現代化有序的發展，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成功事例。我主持舉辦多次相關會議，其中包括；2005 年逾 3,000 人次的國際潮團年會及 2006 年逾 1,000 人出席的全球華人華僑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當中包括幾百位來自台灣的各界人士。他們很多是第一次到澳門，更沒有去過大陸，路氹金光大道生機勃勃，讓他們感覺澳門欣欣向榮。前些年我協助澳門的青年社團組織兩岸四地交流營，台灣南部的原住民大學生青年很多是第一次來澳門，他們進入大陸有心理壓力，感覺過關都要經過很繁瑣的手續，心情很緊張。結果他們在澳門活動完畢以後進入大陸，過程非常暢順，都表示比想象中簡單、暢通得多。到第二年報名的時候人數大量超額。兩岸開放以後，6,000 萬人次台灣民眾到過大陸，但實際上到過大陸的台灣民眾只約有 1/3，還有 2/3 的台灣民眾沒到過大陸，台灣逾 2,300 萬人中很多對大陸不瞭解，澳門可以成爲一個緩衝地。台灣居民乘坐台澳航線來到澳門放松心情後，再入境大陸，感覺更容易接受。我們要让台灣民眾有實際的感受，以點帶面。

李向玉：凡是歷史留下好的東西要繼承，凡是世界上先進的，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我們都要學習，這樣就能保持澳門社會的先進性。澳門有得天獨厚的歷史機緣，可以在世界上與澳門友

好的國家如葡萄牙、歐盟打交道，也可以去日本和美國學習，把先進的東西學到手。如果能把學習到的先進經驗帶回國內，就可以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內地，由於歷史、社會制度原因，它不便於隨便地出國學習。在澳門，特區政府給我們提供相當多的便利，想去哪就去哪，想甚麼時候去就甚麼時候去，這體現“一國兩制”優越性，更不用說澳門與葡語國家有好的歷史關係。通過這種“便利性”，就能夠實現“先進性”，繼而把先進經驗引入國內，這就是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關鍵是澳門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擅用制度上的優勢性、重視人力資源發展。如果高等教育發達，孩子可以學到專業和技能，加上有好的外語能力(英語和葡語)，再加上熟悉電腦操作，就不愁就業出路問題。關鍵是要把基層教育搞好，高等教育發達，澳門居民的就業自然不成問題，不見得都進入博彩業工作，可以任職酒店管理、會展業、旅遊休閒、金融師、會計師等。只要培養出高端的人才，就有廣闊的就業天地，不限於澳門，可以到國內、歐美、葡語地區等地工作。所以澳門人要立足澳門，要放眼世界，要有胸懷世界的思想和理想。

唐曉晴：在兩岸關係上，澳門永遠是有作為的，在達到國家的完全統一以前，澳門的作用是很大的。孫中山在澳門有一段歷史，這是在文化上有一個很好的連接點。澳門與台灣當年一些很好的交流渠道也從來沒有斷過，現在特區政府很重視兩岸關係的推進，將來通過政府資助或民間團體自發組織，兩地居民在文化上交流以及在經濟上合作會更加緊密起來。另外，澳門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澳門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很好，對台灣就是一個示範。如果澳門發展這麼好，而台灣在更優惠的政策下，當然可以發展得更好，由此台灣當然會更願意回歸。亞里士多德的修辭理論強調，說服是一個系統過程，不是僅憑語言。澳門自身的社會發展是說服的元素，從這個角度上，澳門每天都在發揮着其應有的作用。

郝雨凡：“三通”之前，澳門曾在兩岸關係中擔當比較重要的角色，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過程中發揮過較大作用，被稱為“澳門模式”。當時兩岸溝通存在一定的政治障礙，如涉及主權範疇的問題。而澳門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地區，在中間為雙方都預留了空間，通過這種獨特的安排讓雙方進行溝通，有效推進兩岸的交流 and 發展。在那個階段，澳門在兩

岸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比香港還重要。隨着馬英九上台，兩岸關係開始緩和，並逐漸實現“三通”，使澳門的中間者角色功能有所減弱。從經濟上看，“三通”也對澳門造成一定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會太大，只是短期性的衝擊，而不是結構性的影響。因為澳門經濟上的問題主要來自內部，也就是自身如何實現經濟適度多元，這與台灣關係不是很大。從深層次角度來分析，澳門在“三通”之後仍然能夠在兩岸關係中發揮橋樑作用。現階段，兩岸關係只停留在經濟互動層面，雙方都盡可能迴避高度敏感的兩大問題：政治議題和軍事互信。但是，經濟互動到了一定程度，仍然會回到這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上。當兩岸不得不觸及這兩個問題時，澳門應該能夠再次利用實行“一國兩制”的身份，為雙方提供溝通便利，推進兩岸關係。我相信，中央政府應該能看到澳門在兩岸深度對話中可以發揮的作用，澳門也應該盡量配合，促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畢竟，維持中華民族的和諧穩定與和平發展，是兩岸四地人民所樂見的。

懷效鋒：從法律交流角度，澳門在中國統一和推進兩地關係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現時大家更多地關注到產業方面的合作，包括中醫藥產業、經濟園區等，但在法律、文化方面的合作相對較少，然而這方面卻很重要。《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的根本大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但是具體的法律是不斷與時俱進的，必須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而不斷地修訂，這是一個客觀規律。澳門法律也在不斷本地化，即原來以葡萄牙的制度為主的現已逐步演變成有澳門自身特點的制度。從“一國兩制”的長遠發展來看，澳門無論是從經濟、文化、地理等方面，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非常緊密。95%以上的澳門居民是華人，絕大部分居民說中文，可以說是同文同種，地理上也是緊密相連。無論如何，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是離不開與中國大陸的緊密合作，實際上兩者已是水乳交融的關係。澳門居民瞭解中國大陸的法律，將有利於到大陸投資、就業和生活；大陸居民多瞭解澳門的法律也有利於在澳門投資、就業和生活。我認為法律方面的交流，特別是法律文化的融合是長遠的發展趨勢，事實上，司法機關的合作始終是存在的，而且兩地的司法合作是相當緊密和融洽的。澳門在法學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既為澳門居民講授大陸法律，也給大陸學生講授澳門法律，還為兩地學生提供一些共同選修的課程，這有助於人們瞭解兩地法律的不同以及促進彼此交流。澳門科技大學法

學院今年嘗試舉辦司法考試培訓班，通過與北京合作，利用衛星播放上課，課程質量比較高，成本比較低，希望為我們的學生創造條件，也給澳門居民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提供便利。如果澳門的律師通過了大陸司法考試，將來可以為澳門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務。我認為澳門的大學非常有必要講授中國大陸的法律，從澳門與大陸之間的緊密關係來看，大陸法律應該佔有重要的地位。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因此法學院開設課程相應更重視大陸法律。從我們的教育實踐來看，澳門發展高等教育一方面要面向澳門社會，另一方面也要面向大陸，尤其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即使澳門高等教育的生源逐漸減少，但內地的生源可以不斷增加。澳門高等院校應該可以大有作為。從長遠角度看，雖然澳門的法律制度是穩定的，而法律的修訂是要及時的。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一個歷史的進程，更多地瞭解大陸的法律制度對澳門居民來說是必要的；而大陸的相關人員更多地瞭解澳門的法律制度，也是必要的。按着上述思路，澳門高等教育可以通過吸引更多域外學子，更好地發揮兩岸關係的平台作用。中國大陸對台灣學生報讀國內大學的門是敞開的，現時

已經有對台灣、香港、澳門學生免試入學的提法，這有點像國外的“寬進嚴出”。在吸引境外生源方面，香港的做法值得學習。例如香港的主要院校為了吸引域外優秀學生，給予學生高額獎學金，當這些高考狀元到香港的大學學有所成並有了知名度後，就會進一步吸引其他學生到香港學習，就算申請不到獎學金的學生也願意付高額學費入讀。澳門是否可以考慮借鑒香港經驗，提供高額獎學金吸引澳門以外的優秀人才來澳就讀，甚至可以放寬這些學生特別是具研究生學歷的在澳門就業的政策。雖然現時有技術移民政策，但還應考慮其他吸引措施，未必一定要牽涉到居留權，從而活躍澳門的人才市場。澳門還是要更開放，才能夠不斷地吸引人才。現時大陸已有學生到台灣作交流訪問，但真正去念書的不多，反而來澳就讀的比較多。改革開放後，亦有一些台灣學生到中國大陸念書，但到澳門的不多。台灣學生較少來澳門就讀主要是認為澳門的教育質量不高以及特色專業不多。澳門是一個開放社會，各所大學都可以自主辦學，吸引內地及台灣學生都很方便，如果澳門積極吸引國內外的師資，其作為大中華區高等教育的平台是十分有意義的。